

文史资料选刊

第六期

- 记老舍与齐白石的一段交往..... 杜刃锋
- 顺乎民意的壮举..... 延昌 徐冲
- 北京托运业的由来和发展(上)..... 赵伯华
- 关学曾和北京琴书..... 宋家玲
- 解放前的北京扇画店..... 潘治武 马长林
- 法藏寺塔..... 陈德光
- 地位特殊的清庭三房..... 赵润田
- 日本天皇特使遇刺事件之我闻..... 孟宪章
- 蒋经国的3811部队..... 魏雨民
- 策反“陆大”起义的经过..... 陈济生
- “花市这条街”专栏(三)
- 什刹海和义留胡同..... 何健之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崇文区委员会编

记老舍与齐白石的一段交往

汪刃锋

著名文学家老舍，是一位具有深厚的民族文化基础而又兴趣广泛、知识渊博的作家。他对戏曲、音乐、绘画都很爱好，对中国画更特别欣赏，而对白石老人八十岁以后所作的画简直可说是爱之入迷。老舍与齐白石，一个是作家，一个是画家；一位是当代的语言大师，一位是当代的艺术巨匠。二位互相倾慕已久。老舍解放初从美国回国后主持了北京市文联工作，他与白石老人自1950年5月召开的北京市第一次文代会上相遇后，就经常去看望老人，日子一长，二位也就成了契友。

1951年春，有一天老舍来到市文联（霞公府15号）。在东跨院楼下主席办公室写字台前坐下，便和我聊起，北京有些国画家，解放以后生活很困难，看看想点什么办法帮助他们解决目前的生活问题。我便提出自己的设想说：“可不可以把他们组织起来，发挥他们的一技之长，以求自救。当然市文联从团结他们出发，四时八节给他们送点礼，发点救济金，是应该的，但也只能解决他们暂时的问题，从长远看还是组织起来，按照他们自己的能力就业自救，是否比较可行……”。

老舍沉吟了一会儿，“噢”了一声，说：“现在我们正在搞社会主义宣传教育。有些国画家的画路很窄，有的一辈子只会画梅花，有的只会画老虎，有的专攻山水，有的只能画仕女。要他们画现代人物，那可就不行了。因之，这类画家的出路十分困难，而他们却三天两头来求我。他们听说我喜爱白石老人的画，便源源不断地把白石老人的画送到我家里来求我收藏。开始盛情难却，我也就收买了一些。日子长了，人来多了，真的假的都拿来了，而我也就应酬不暇了，有些画我也分辨不出真假来。我只好去请白石老人过目，由老人自己鉴定。其中有一幅紫藤蜜蜂，老人看了又看，说这是他八十以后的作品，并且又重新在画上题了字，并署上白石重见旧作的款识。”老舍又说：“将来可以成立一个国画研究会，吸收这些国画家参加，也可以组织他们搞点工艺美术产品，像画书签、灯片等。”

这以后，老舍趋车去西城跨车胡同看白石老人，时常约我同行，当时我也乐意同去拜访白石老人。

记得我第一次随同老舍去拜访白石老人的时候，是1951年初夏的一天上午。齐府上看门的那个黄面皮的老头以及服侍老人的中年女看护，看到老舍是熟客，便把我们一直领到白石老人的客厅。白石老人见我是一生客，便问：“老舍，这位先生是谁？”老舍即刻介绍说：“这是我们市文联的一位木刻家、画家刃锋同志，他多年从事木刻和绘画。”老人接着问道：“是不是雕花细木活？”老舍解释道：“不是。他是把画稿画在木板上，雕刻

2046/31

出来，然后再把它拓印出来，叫作木刻版画。他与您老年轻时候所从事的细木雕花活可不一样。这是一门新兴的艺术。”老人听了注意地看着我微微地点头，“啊啊”两声。

白石老人很高兴，他把挂在裤带上的那一串钥匙拿出来，打开厨柜，取出一只匣子，把点心从中拿出来，然后放在一只瓷盘里招待我们。这时老舍低声示意我说：“老人拿出来请你吃的东西，你要吃，不吃他会不高兴的。”于是我顺手拿了一块饼干放进口中，大概时间久了，饼干已经变硬了，咯嘣一下才咬动。老舍带来几幅画，有残荷蜻蜓、牵牛、墨蟹等，请老人鉴定是不是他七十以后的作品。老人一一仔细看了，有几幅，老人说是他画的，也有一两幅老人指出是别人代画的。鉴定完作品之后，老舍对白石老人说：“老人，您的画不但咱们中国人喜欢，外国朋友也十分喜欢，他们对您也非常仰慕。新中国成立了，您的画也受到了国家的尊重，再也用不着到处奔波了。将来国家还要把您的杰作收藏到国家博物馆里，好好保存起来，流传后世哩”。老人听了高兴地说：“知我者，老舍先生也。你是我的知音，我非常感谢你对我友情。老舍先生，我要向你磕头。”老舍哈哈一笑，接着对老人说：“找一个天气好的时候，我约老人去中山公园的来今雨轩喝茶，吃点小吃。改天我用车子来接您去，您可以去吗？”老人嘻嘻笑道：“好好，我从命。”

二

1951年初秋的一天上午，我去看老舍。一进客厅，一阵花的幽香扑鼻而来，真可谓沁人心脾也。我问了一声：“舒先生在家吗？”老舍便从西边的书房兼卧室里走了出来。他手上还捏着几张稿纸。我在他对面的沙发上坐下，老舍指着手里的稿纸对我说：“我正在给白石老人寻找画题，刚巧我在阅读苏曼殊的诗词，顺便摘录了几段，你看看选得如何？”我接过来一看，原来那上面是节录下来的一些诗句。如：“凄风苦雨更宜秋”；“芭蕉叶卷抱秋花”；“手捧红樱拜美人”；“几度寒梅带雪红”；“蛙声十里出山泉”。我读了之后，觉得这几句诗选得很有意思，不一般化。我诙谐地说：“你这几道题，也是对白石老人的一场考试哩！”老舍哈哈一笑道：“这个难不倒白石老人，老人不仅是个画家，还是一位诗翁哩！”

几天后的一天上午，我和老舍一同乘车去看望白石老人。不一会儿，汽车开到了胡同口，我们下了车，沿着胡同来到白石老人家的门前，叫开了铁门，便向后进正厅走去。这儿坐北朝南的一敞三间房，东面是老人的卧室，中间和西边的通间是老人的客厅兼画室。这时只见白石老人正站立在画案一边悬肘作画，周围是他的女弟子们，当时有胡絮青、郭秀仪、张容玲、郭肖清等。此外还有一位中年男子，正在给白石老人理纸，他是李可染。老人带上双重眼镜，正聚精会神地画一幅写意樱桃，樱桃画得既水灵又透亮。托放樱桃的圆盘似粗笔蘸墨一挥而就，显得雄浑有力。李可染看出这是一幅佳作，便对老人说：“老师，这幅画给我了。”老人透过镜片抬头望了一眼未说话，便又着手画第二幅梨花春意图了。刚画完，郭秀仪接着便说：“老师这幅画我要了。”不大功夫，老人画了四五幅画，都为在场的弟子们收藏去了。

这时老人开始休息，他坐在躺椅上一面休息，一面和老舍说话。老舍坐在靠近老人的

一边，从口袋里掏出那张摘录的诗笺，并从西服里兜取出一叠人民币送到老人面前，乐呵呵地说：“老人，这是我刚收到的一笔稿费四十万（折合改币后的四十元），请老人喝茶买点心吃。另外我还摘录了几段诗句，求老人画几幅诗意画哩！”白石老人接过诗来，通篇看了之后连声说：“好！好！老舍先生，你非常有眼力，选的几句妙极了。诗中都寓意着生动的画境，我一定好好的琢磨。”老人一面看，一面低吟道：“‘凄风苦雨更宜秋’。这个秋字是诗眼，我要把这个秋字托出来。‘蛙声十里出山泉’。这幅画可不好落，首先要把这蛙声十里画出来全盘才活。画是无声的诗，但要表达出画本无声胜有声，才有意思，这是个绝活。”再往下看，老人说道：“‘芭蕉叶卷抱秋花’。这句诗巧，诗的本身就是一幅画。‘几度寒梅带雪红’……”看到这里，老人已有几分倦意，也渐渐迷糊了。老人靠在躺椅上闭目养神，一会儿，便鼾声如雷地入睡了。这时已近中午，为了让老人好好休息，我们便悄悄告别了白石老人的画室，登车返回了。

三

北京的秋天瑰丽宜人。一天上午，我正在群众艺术馆的三楼（文联宿舍）里关着门作画。忽而仿佛听到手杖有节奏地撞击楼梯的咚咚声，而这声音已渐渐地接近我的房间。我立刻搁下笔开门迎出去，原来老舍先生，拄着手杖一步步地朝我这边走来了。我笑着说：“舒先生今天怎么得闲出来走走？”老舍说：“在书斋里呆腻了，便想出来走走，看看老朋友嘛！”我说：“请您坐下歇歇。”老舍坐在我的转椅上，转过身来，正对着墙上晾着的那几幅马。老舍端详了一会，指着画对我说：“刀锋，你何必画悲鸿的马，悲鸿自己画的马四条腿也未安排得当；诚如郑振铎所说的：‘悲鸿的马总是三条腿，总是有一腿画不好。’”我听了老舍的批评，便为自己辩解说：“我是在练工笔，也不是专学徐先生的马。我不是也在学习白石老人的用笔用墨吗？”我便从桌上翻出几幅画，一幅是葡萄，一幅是棕榈小鸡，一幅残荷。这是我照着不久前从荣宝斋经理侯恺那里借来的几幅齐白石原作临的。老舍看着画说：“你这几张临得要比那马画的好。还是多向白石老人求教，老人功力深，差不多画了六七十年，向这样一位老画家借鉴求教是非常难得的，这比你闭门画马要有意义得多了。”老舍停了一会儿又问道：“端木在家吗？”我说：“在，他未出去就在我隔壁。”于是我们便走进端木蕻良的房间里。

端木在书案前写京剧剧本，桌上堆放着许多参考资料。老舍对端木说：“我今天特意来看看你和刀锋这两位老朋友，大家碰碰面聊聊天。”老舍告诉我们，今天早晨白石老人的女看护给他打了个电话，说是老人在家发脾气，这几天又吃得不好，又没有人来看他，他在家里生气。老舍接到电话之后，便给文联挂了个电话，叫秘书在萃华楼定了一个房间一桌菜，约白石老人来萃华楼便餐。老舍对我们说：“一会儿咱们一起到东安市场萃华楼去吃饭，人不多，就咱们几个人。主要是请白石老人，请你们二位也去作陪。”于是我和端木、老舍三人一路走，一路聊天，不知不觉地已到了东安市场，来到萃华楼后院预定的那个包间。老舍是主人，作陪的除我们两人外，还有文联副秘书长王松声、胡絮青大姐以及老舍的小女儿舒立。不大一会儿，文联的汽车把白石老人接来了，陪同老人来的还有那

位中年女看护。大家围坐在一张大圆桌周围。白石老人坐在首席上，着一件中式玄色长袍，手持朱漆拐杖，鹤发银须，颇有点仙风道骨之感。

老舍首先说：“今天我们特地约了几位朋友来请老人小聚，在座的有作家、画家、戏剧家，他们都景仰老人的艺术。还有一层意思，作为我对老人为我作画的感谢，让我们大家一起为老人健康长寿干杯！”老舍举起杯，大家一同举起杯向老人敬酒，老人也站起身来举起酒杯啜了一口，便说：“老舍先生，我要特别感谢你，我要向你磕头。”逗得大家哈哈大笑。老舍十分尊重白石老人，老人也非常尊重老舍先生，他把老舍看成是知音。老人常说一句话：“老舍先生，我要向你磕头。”这表示老人的感激之情。

老人已九十二高龄了，然而他的视力、听觉都很好，对于常去看他的人大多都认识。老人白齿也很好，在这次的筵席上，老人特别爱吃松鼠鱼。松鼠鱼做得外焦里嫩，老人吃得很香，连胡须都沾上了油汁。老人是湖南人，很爱吃点辣味，对萃华楼名菜芙蓉里脊也很感兴趣。饭后喝了点茶，端木和松声有点事先走了。最后由老舍用汽车送白石老人回跨车胡同。

我们尾随着老人一同走进客厅，白石老人很高兴地从画案下的抽屉里取出一卷画来，展卷一览，则别有一番风味。第一幅是“芭蕉叶卷抱秋花”。画面上是一株硕大的芭蕉，层层叶片有规律地卷抱着一枝尚未开放的黄色花蕾。章法简洁有韵致。老人指着画说：“老舍先生出的这个题在‘卷’字上，使我感到为难了，但不知芭蕉是向左卷还是向右卷。后来经过我仔细地观察，原来芭蕉是向着日光的方向卷，于是我得到了启发，终于把‘卷’字和‘抱’字画出来了。”第二幅是“凄风苦雨更宜秋”。画面上是一幅秋江烟雨图。风把柳叶推倒到一侧，在绵绵的秋雨中一只小舟逆着风雨缓缓地驶去，老人用他特有的笔法和线条，把诗中的意境烘托出来了。第三幅是“手捧红樱拜美人”。老人画了一只长颈花瓶，白底黑花，瓶的正面画着一条昂首挺胸张牙舞爪的墨龙。瓶口插上一束盛开的折枝樱花，右下方是一只圆盘，盛着满满的樱桃。盘托是用粗笔蘸墨画的，真可谓诗传画意、画解诗神了。老舍看了满意地连连叫“好！好！”一般的画家作画多半求熟，而老人却求意。白石老人琢磨出来的画，使你越看越觉得有味儿。又一幅“几度寒梅带雪红”是四尺整纸的，白石老人善于在大的尺幅上发挥他的气势，并且处理得浓淡疏密相宜。这是一幅雪梅，在老干和交叉枝上落着厚厚的积雪，在积雪和枝秆下面，突出一枝怒放的红梅，不由得使你联想到梅雪争春的诗句来，诚可谓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也。最后拿出来的是张四尺对开的条幅“蛙声十里出山泉”。白石老人略带几分得意地说：“老舍先生，你造的这句诗，我思索了好几天，不但要画出蛙还得画出声音来。画，古人说是无声的诗，我怎样从画面上画出声音来？还得有十里之遥，这可难倒我了。最后我悟出道理来了，我用蘸墨湿笔，画出两山之间一道流泉，倾泻而下，势如奔马，何止十里！一群蝌蚪顺流而下，在泉中嬉戏，这儿你不是也可以听到青蛙妈妈在召唤它的子女的呱呱声么！”老人兴致勃勃地谈论他的创作思想，老舍聚精会神地听。听到精彩处，老舍情不自禁地伸出大拇指称赞道：“高！老人的见解高！这句诗给您画活了！”

顺乎民意的壮举

——记冯莲溪参加和平解放北平谈判的经过

延 昌

徐 冲

1948年12月上旬，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野战军解放东北全境，迅即挥师入关，会同华北野战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国民党华北“剿匪”总司令傅作义指挥下的六十多万国民党军队分割包围于北平、天津、张家口、新保安、塘沽等地。12月底，围歼新保安之敌，攻克张家口。1949年1月中旬，全歼天津守敌。至此，北平傅作义部二十余万守军，被严密包围，如瓮中之鳖，陷入绝境。配合强大的军事攻势，中国人民解放军，又以宽大政策的巨大感召力量，对傅作义发动了强有力的和平攻势，敦促傅作义接受改编，和平解决北平问题。

“中国革命的怒潮正在迫使各社会阶层决定自己的态度。”（毛泽东：《将革命进行到底》）迫于形势，傅作义将军亦萌生了和平解放北平的意向，先后秘密派出崔载之、周北峰、邓宝珊为首的三批和谈代表，与解放军谈判和平解决北平问题。也就在这一政治背景下，“华北人民和平促进会”成立，公开参加到北平和平解放运动的行列，为支持与促进傅作义和谈行动，壮大了声势与力量。

“华北人民和平促进会”的成员成分与动机相当复杂。它的主要发起人与组织者，是北平参议会议长，国民党北平市党部前主任委员，国民党中央候补委员许惠东，他是抱着“政治入股”的投机心理组织这一团体的，其中东北逃亡入关的国民党官僚与劣绅也不乏其人，但他们都不能悖逆民意和扭转历史车轮的方向。同时，戊戌变法的首领康有为的女儿康同壁，前中国大学代校长吕复（吕剑秋），以及主张和平的社会知名人士梁漱溟、何海秋、周炳琳等，也先后加入“促进会”，特别是因支持李宗仁而触怒蒋介石，丢了官，具有爱国心、正义感的原北平市长何思源先生也参加进来，使“华北人民和平促进会”的政治影响大为增强，逐渐形成了一个包括平、津、晋、绥、察、热、冀五省两市参议会代表，北平市总工会、商会、工业会、农会、妇女会、教育会等民众团体代表的非官方大型组织。

就是这个组织，在征得傅作义同意之后，组成了“华北人民和平促进会 和谈代表团”，于1949年1月18日，出城赴人民解放军前线司令部，转达北平人民的和平愿望，呼吁国共双方举行和平谈判，“为北平的和平解放积极奔走……对北平的和平解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1982年4月28日，新华社发布的何思源逝世消息语）

“华北人民和平促进会 和谈代表团”成员十一人，具有较广泛的代表性，他们是，社会知名人士何思源、吕复、康同壁，（女）、北平市总工会王乔年，马振源，北平市工业会付华亭（后因病未能出城），北平市商会张宝万，北平市妇女会卢其然（女），北平市

教育会冯莲溪(女),河北省农会郭树棠,以及河北省商会刘鸿瑞。如今,事隔三十五年,代表团成员大多作古,仅冯莲溪、王升年在世。笔者最近访问了冯莲溪老人,她已八十岁了。经过几次的座谈,得知情况如下。

冯莲溪,1904年出生于北平一个城市贫民的家庭里,一生从事小学教育事业。13岁丧父,她陪伴着年迈的母亲,颠沛流离,在艰难困苦的生活境遇里挣扎苦斗。险恶的社会环境,锻炼了她泼辣、大胆、倔强、不屈于命运的性格,也孕育了她热爱生活,鄙视黑暗,向往正义与光明的思想感情,奠定了她日后参加和谈代表团的思想基础。

日本投降以后,失业许久,正和母亲一起做炸面豆小买卖糊口的冯莲溪,在一个偶然的会里,由学生时代的一位同学推荐,谋到了北平永定门简易小学校长的职位。凭着她大胆的创业精神和对儿童求学的一片热忱,将这个仅有三名教师,两个教室的小学校搞得生机勃勃,冯莲溪因此在社会上,在同行中便小有名气了。但是,事业的发展,并没有丝毫改变教师们贫穷的困境。1945年初,教师张泉母丧,无力买棺木下葬,停尸于堂,冯莲溪焦灼万分。恰值此年3月8日,市长何思源假长安戏院举办“三八”妇女节电影招待会,冯莲溪应邀参加,她认为这是一个机会,立即提笔拟就募捐启事,以便在会上寻求社会资助,帮张泉渡过葬母难关。

3月8日,长安戏院座无虚席,各界妇女汇聚一堂,喜气洋洋欢庆抗战胜利后第一个“三八”节。市长何思源主持大会,慷慨激昂地介绍了妇女在抗日战争中的巨大贡献。冯莲溪首次见到何思源,对他的爱国感情大为激动。在放映电影《八千里路云和月》之前,何思源步下讲台,路经冯莲溪身旁,冯莲溪立刻呈上募捐启事,何思源阅毕嗟叹不已,当场提笔捐款五十元。某校长捐款五元,冯莲溪也资助数元,为张泉安葬了母亲。

冯莲溪和何思源此次交往,便成了她后来参加和谈代表团的外在契机。

1948年底,中国人民解放军收紧了对北平的包围,49年元旦刚过,便占领了南口、怀柔、顺义、通县、门头沟、海淀、丰台等地。国民党溃军如惊弓之鸟,乱哄哄退进城内,狼狽不堪。城外,枪声时起时伏,并时有解放军发射的炮弹轰然作响,落在天坛、东单两个简易机场上。北平城内骚动不安,大战在即,老百姓惴惴不可终日。和平,是北平群众普遍而强烈的愿望。

冯莲溪于1948年已调任西直门小学校长。国民党败兵涌进学校,所有教室都成了临时兵营,学校已无法上课了。北平城内传闻傅作义有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意图。冯莲溪得知了何思源先生加入了“华北人民和平促进会”,并准备出城谈判的消息后,她对何思源素怀敬意,便立刻串联教育界三、四十位同业妇女,自动集会组织教育会,一致决议拟出呈文,呼吁和平解决北平问题。

鉴于北平城内的复杂形势,呈递呈文也需要勇气,与会妇女们大多胆怯。冯莲溪自告奋勇乐于承担此任,大家一致拥护,经反复商讨,又推出陈克勤与另一名中学女教员,组成以冯莲溪为首的三人小组,呈递和平呈文。

1949年1月16日下午,冯莲溪等三人至府右街南口北平市参议会大楼,呈递和平呈文。一位姓张的官员出来接见,很高兴地说:“现在华北人民和平促进会,在这里开会,何思源先生将率领代表团出城与解放军举行和平谈判,你们的呈文,代表民意,送来得正是时

候。”

冯莲溪一听为之心动，又想到教育会交付的责任，急迫感便油然而生，于是马上接言道：“我们认识何思源先生。有各方面人士参加的代表团才更有代表性，我们愿以教育会代表名义参加。”

“这……”姓张的官员面有难色，说：“和谈代表已经选好，名单不日见报，并且代表团明天就要出发，不好加入了”。

冯莲溪岂肯放过良机，十分恳切地说“我们的名字见报与否无关紧要，为和谈出力才是当务之急，我们要和平的心情是一致的。今天我们已经来了，假如正式代表不可能，那么，妙峰山烧香——随伏，非正式代表也可以么，这也是教育界妇女的共同心愿。”姓张的官员沉吟片刻而后说：“你们的要求很恳切。这样吧，三人太多，推一名代表去吧”。三位女性十分高兴，当场推定冯莲溪。临走时，官员叮咛：“明早七点以前，请准时前来参加会议。”就这样，冯莲溪加入了“华北人民和平促进会和谈代表团。”据1949年1月19日北平报载：“华北人民促进会，和谈代表团于十八日下午二时出城谈判。代表团成员是：吕复、康同壁、郭树棠、王乔年、张宝万、卢其然、马振源、刘鸿瑞、冯莲溪何思源，共十人。”

原订17日出城谈判，为何晚了一天？原因是何思源先生遭到了国民党特务的暗算！

1月17日，冯莲溪起了个大早，里里外外换了一身新衣，同事们高高兴兴来相送，冯莲溪登上电车，向大家挥手到别：“请放心，我一定把大家的和平愿望带到。诸位费心照料学校，以免被驻军毁坏。”

七点以前，冯莲溪兴冲冲来到参议会，参议会却冷冷清清寂然无人。过了良久，才见人们匆匆进出，个个面色阴郁，步履沉重。那位姓张的官员一见冯莲溪，便放低声音告她：“今天代表团不能出发了。昨夜何思源被特务安放定时炸弹炸伤了胳膊，他的妻子伤势尤重，何先生二女儿亦被炸死。现在何先生已送进了协和医院……”

冯莲溪听罢一怔，继而气愤又忧虑，特务的手段实在卑鄙，代表是否还能出城？北平民众的和平愿望如何传达呢？……

上午九时许，代表团成员召开了紧急会议。许惠东主持，他先报告了何思源被炸经过，然后谈虎色变地提议和谈代表团出城之行作罢，他说：“否则大家都可能遭到更大危险……”王乔年不等许惠东的话说完，立刻站起来与之争辩，态度坚决地指出：“出城和谈是大会的决定，任何人无权擅自更改。”冯莲溪情绪激昂，大力支持王乔年的意见，说：“我们民众团体参加和谈代表团，是肩负着北平数百万人的重托的，小有挫折便退缩不前，还配当和谈代表么？谁害怕危险发表声明退出代表团就是了！”经过激烈的争论，决定仍然出城谈判。于是代表们一起前往协和医院探望何思源先生，一方面表示慰问，一方面征询他的意见，

何思源先生肘部缠着绷带，他请代表们落座，对大家的关心表示感谢，然后说：“特务对我下此毒手，目的就是在阻止和谈。和谈，是民心所向，事关重要，我个人区区小伤算得了什么？为了和平解放北平问题，我就是拼出性命，也觉殊荣。出城和谈，绝无罢休之理，莫说我目前伤势不重，就是重伤行动不便，叫人抬着，我也要出城参加和谈。”

席话使代表们颇为感奋，当场商定，事不宜迟，次日即刻动身出城。

1月18日下午，冯莲溪赶到马相胡同，与各位代表汇集，见到何思源，立刻上前表示再慰问。许惠东见这位女代表过于泼辣、毫爽，于是抽空把冯莲溪拉到一旁，不无警告地提醒道，“此次出城和谈，非同小可，须言语谨慎，何市长为首席发言人，其他人就不要乱说了。”

一时许，代表十人（付华亭因病临时缺席），登上了一辆大篷汽车。开车之前，有一个身着整洁的兰色斜纹中山装的人，手提一只大提箱，也钻进了汽车。何思源介绍道：“这是我的随从。”汽车开动以后，才有人悄悄告诉冯莲溪，这位官员，名叫张实，是中共派来与何思源联系的地下工作人员。

汽车开到西直门，国民党守军少将司令官许书亭走上车来，他面容憔悴，一脸堆笑，饱含期望地和代表们握手，连道“辛苦、辛苦”。一群记者也随之而入，请代表们签名，并纷纷表示：“诸位不辞辛劳，为北平民众谋行善事，我们欢送诸位，祝你们成功。”

汽车驶出城门，车上打出两面白旗。上面用黑字醒目地写着“华北人民和平促进会代表团”字样。汽车沿着京颐公路北行，道路弹坑累累，坑洼不平。田野里，战壕纵横弯曲，小丘上，是一座座碉堡。公路上的铁丝网路障比比皆是，车速相当缓慢。当汽车绕来绕去，避开地雷区，通过国民党守军的最后一道关卡走不多远时，前方突然响起一阵枪声，只听有人大喊：“停车、停车！”

代表团成员没有上过战场，惊惶万状，有的爬伏于车厢板，有的钻在长椅下，冯莲溪歪在长椅上，胆子稍壮，抬起半截身子探头观望，不知被谁一把拉住按倒说：“快爬下！不要命啦！”枪声几起几落，汽车刹住了。司机招呼道：解放军拦阻，不知出了什么事，你们哪一位下去看看。”冯莲溪恰在车门边上，翻身站起说：“我去。”正迈腿下车，被代表团最年轻青的代表王乔年拉住说：“您别动，还是我去吧。”说罢，带着一面小白旗，钻出车子去了。

过了片刻，两位解放军跟着王乔年登上汽车，一位提着匣枪，一位端冲锋枪。提匣枪的解放军叫大家不要怕，面带笑容地和大家一一握手，说：“诸位受惊了，昨天已准备好欢迎你们，你们没有来。今天不知代表团光临，发生了小小误会，对不起得很。我是解放军连长，专门迎接你们来了。”

原来解放军对空鸣枪，示意停车检查，国民党守军以为代表团受到袭击，于是便向前移动准备救援，解放军不知何故，因而开枪射击。幸好王乔年赶到说明情况，又摇旗呐喊，使国民党守军退了回去，一场误会这才解除。

汽车继续前行，拿冲锋枪的战士一手攀着车门，一手端着枪，站在车门外脚踏板上同行，一路上再未遇阻。傍晚时分，汽车开进一座四合院，到达海淀槐树街一号解放军前线司令部招待所。

来自城内的和谈代表团受到解放军的热情接待。代表们在一间大屋刚刚坐下，一盆盆热水便端了进来，一条条雪白的毛巾递到大家手中，请大家洗脸休息。不一会，又端来几盘花生瓜子，摆上一盒盒大象牌香烟。小憩以后，招待晚饭，有酒有肉十分丰盛。代表团成员和解放军按四、三比例（四个解放军，三个代表）分桌入席就餐，气氛相当融洽。冯莲

溪在城内已有一个多月未见荤菜了，此刻，她感到和家人节日团聚一般的温暖、愉快。

晚饭过后，司令部莫文骅政委等领导人健步来到代表团驻地，莫政委一身戎装，干练利索，精神奕奕。他和大家一一握手，请大家落座，互致寒暄。代表团一一递上名片，会谈开始。

莫政委首先致词，对代表团的到来，表示欢迎，并说：“昨天准备好了，叶剑英同志亲自接见大家。今天他赴津有事，不能来了，委托我接待大家，并代他向你们致意。”代表们情不自禁鼓起掌来。何思源接着发言说明来意：“我们代表北平二百五十万民众向贵方致意，殷切希望国共双方以大局为重，保护北平这座文化古都，使市民生命财产免遭损失，和平解决北平问题。”吕复、康同壁两先生又先后转达了华北人民的和平意愿。莫文骅将军接着说：“我们对诸位的和平愿望表示欣赏。对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我方已表明了原则态度，正是以保护北平文化古都，维护广大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为出发点的。同时，也是给傅作义将军指出了一条弃旧图新、将功折罪的光明之路。”何思源接着言道：“傅作义将军也是为了保护北平古都，保障二百五十万市民的生命财产不受损失，才表示同意我们提出的和平解决的主张……”莫文骅立刻态度严峻地插言：“这里有个是非问题需要特别明确：‘不是傅作义保护了北平，倒是北平这座古城被傅作义用来作为掩蔽体。真正为了保护北平，珍视北平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是我军而非傅作义。’”何思源辩解说：“傅作义将军一向是尊重民意的，他的部队不扰民、不害民……。”莫文骅把手一挥，不无讽刺地说：“傅作义如此‘爱民’？难道我们革他的命还革错了？我们是人民自己的军队，是以推翻祸国殃民的蒋家王朝为己任的，这也是人民的愿望。谁替蒋介石卖命，谁就站到了人民的对立面。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打不赢，就是因为和人民的利益背道而驰。如若不信，请诸位告诉傅作义，为北平古城计，为北平人民计，把部队拉出城来，我们可以让出一片战场，彼此较量一番，不要躲在北平城里耍赖！”莫文骅将军义正词严地强调指出：“现在，摆在傅作义面前的有三条路可供选择：一条是打，请他把队伍拉出城来一决雌雄，可以肯定，傅作义必然一败涂地；第二条，无条件投降，将队伍开进指定地点，听候收编；第三条路叫做‘和平解放’，订它几条君子协定，同样请他把队伍拉出城外改编。总之，第一条道路不用说了，那是一条死路。第二、三条路，我们均可以保证傅作义将军及其部下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三条道路他都不同意，我军将被迫采取攻城之路，那么，破城之日，老百姓和古都文化遗迹遭受损伤，罪责只能由傅作义承担，他将成为历史的罪人。我军对北平多日围而不攻，就是给傅作义以时间考虑，不过这时间是有限度的，请他尽快答复，超过了时限，就不要怪我们不客气了！”

莫文骅侃侃而谈，凛然正气，令人折服。会谈结束时，他说：“你们是民众团体的代表，会上发言不够普遍，我们想详细听听其他代表的意见，欢迎诸位和我们的同志个别交谈。”说完退席了。于是会议改为分组对谈，气氛顿时活跃起来。有位中年解放军同志找到冯莲溪，自我介绍名叫王嵩，亲切地询问冯莲溪的职业、家庭情况，然后说：“你们的何思源先生，为和谈险遭特务毒手，这说明反动派狗急跳墙十分猖狂。作为一名妇女：你出城来，很危险，你不害怕么？”

“危险是有的。”冯莲溪说：“但是，为古都北平，为全市数百万百姓的生命安全而来，

我就什么也不怕了。古人说的好：‘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和平解决北平问题，是全市百姓的心愿。想想看，战火一起，物毁人亡，北平人民受的损失，可就太大了……”王崧点点头表示赞许，他又询问了许多北平城内的情况。天晚了，王崧客气地说：“你们旅途劳累，早些休息吧，晚上不要随意走动，以免发生误会。”

第二天，冯莲溪和同屋康同壁、卢其然早早起床，洗漱完毕，便好奇地跑到大门口观望，只见海淀区街繁荣，卖蔬菜的小贩连摊摆开，人来人往，好不热闹，与城内商业萧条，形成鲜明对比。行人情绪安然，无一惊惶，冯莲溪等人，无比惊叹。

早饭的饭菜仍很丰盛，解放军为代表团饯行，莫文骅及诸位领导又来探视，彼此谈笑风生。冯莲溪毫不拘束地向莫文骅反映：“北平市内供电不足，晚上常常停电，而且吃水困难，大街上差不多一个月不见卖菜的了，老百姓感到很不方便。”莫文骅很认真地说：“不要发愁，我们马上想法多供水电，如果条件许可，我们可以把卖菜的商贩放进城内，借以方便百姓……”

红日东升。九时左右，解放军送代表团登上汽车，握手告别，同时搬来不少宣传品，嘱代表们入城后散发，并且特别关照：“请诸位谨慎小心，宣传品不要分开散发，以免给你们带来麻烦与危险。”

汽车按原路驰返，沿途见到解放军阵地，有不少醒目的白色标语：“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打进北平城，活捉傅作义”等等。战士们严阵以待，士气高昂。车至西直门，国民党守军立刻围了上来，争相询问和谈情况，当代表们回答：“和平解决大有可能”时，士兵们无不欢呼雀跃，国民党军队士气不振，厌战情绪十分浓重，在车上，代表们一致推定何思源、许惠东面见傅作义将军，汇报和谈情况，敦促傅作义早日接受和平解决北平条件。

车至参议会，已近中午，代表们分别回家，冯莲溪怀里揣着宣传品，绕道先逛东安市场，偷偷地把宣传品在市场，北平饭店门前散发完毕。

冯莲溪回到学校，老师们和左近百姓纷纷前来慰问并打听和谈情况。“和平有望”的消息使人们笑逐颜开，无不奔走相告。这时有位女一中教员张淑明挤进人群，约定次日专访，

第二天，张淑明来了，她带着冯莲溪直奔中南海，傅作义的秘书焦实斋已等待他们多时了。冯莲溪向秘书焦实斋详细陈述了和谈情况而后说：“解放军把我们这些来自民众团体的代表视为上宾，招待至诚，十分热情，真可谓仁义之师。他们请我们转告傅将军，只要他不要两面手腕，接受和平条件，和平解决就没有问题。”

由于多方面努力促进，傅作义终于和解放军达成了《北平和平解放协议》，七百年古都宣告解放，北平城内万民欢腾。中国人民解放军举行盛大入城式那天，冯莲溪喜泪盈眶，带领全校小学生，分列西直门大街两旁，举着“欢迎解放军入城”，“庆祝北平解放”的大标语，摇动着五彩小旗，夹道欢迎解放军。她沉浸在欢乐的海洋里了。

北平城回到了人民的怀抱，也标志着冯莲溪人生道路的新起点，她和古老的北平一道，从此换了新颜。

1984·9

北京托运业的由来和发展（上）

赵伯华

（一）

托运业起源于前清末叶，随着铁路建成以及火车、汽车、轮船、飞机等交通工具的发展，近代化运输事业由于宏观需要，托运行业就应运产生。它的前身是大车长途拉脚和一个与它性质相类似的是“保镗”行业。它们的业务都是承运客货，把所受理的物品从甲地安全运送到乙地，收取相应的运费或手续费。火车等现代化交通事业兴起以后，大车拉脚、保镗的行业就被淘汰了。随之而来的是“托运业”。托运业和大车拉脚，保镗有相同及不同的地方。相同的都是把顾客委托的物品从甲地运送到乙地；不同的是托运业本身没有运输工具，而是全凭运输经验，熟练的手续，代表顾客向运输部门办理运货手续，是属于服务性质的行业，因为是受顾客的委托运货，所以称为“托运”。

北京托运业的创始，大约在一八九〇年前后。前门外奎庆胡同有一家弟兄数人开设沙记鞋底局，掌柜的姓沙，名永祥，以从北京往天津贩卖布鞋底为业，运货方法是雇大车和牲畜驮载。一八九三年火车修通到北京，沙掌柜就改从火车随身带货往天津，当时火车还未办理货运。由于他经常往来京津，其他商号也有委托他带信，带货，并收取一定费用。久而久之，带信带货的收入超过他主营鞋底的买卖。于是他就以广招徕，开展带信带货业务。以后货物越来越多，火车也开始办理货运，于是他把带货改为运货，把主营鞋底改为主营运货了。这时，他的运货量转过来以从天津运北京的为多，经营方式是“包运”。从天津某处运到北京某处交货，每百斤收托运费若干。由于只此一家，利润数大，很快就发了财。在天津设立沙记栈，北京设立分栈。（当时本行业通称“货栈”）后来因为赚钱太多，弟兄不和，就分了家。把货栈分成两号，一个叫“永祥沙记”，一个叫“庆成沙记。”两个沙记，天津北京各设总号和分号。

进入民国后，随着近代化交通事业的发展，北京托运业如雨后天春笋般的拔地而生，纷纷围绕着各条铁路开设托运栈（俗称转运公司）。如前门东西两车站，永定门车站，西直门车站，都有这种行业的设立。从此发展成一个专门行业。这个行业的形成就是从鞋底局转业开始的。以后开设的托运栈也都成了暴发户。这个行业最兴旺时期是从前清末叶至一九二八年。当时革命北伐成功，政府南迁。而后由于一是社会政治中心的转移，北京市面有些萧条，二是托运业家数增多，互相排挤，托运业一度从兴旺走向衰落。但不久由于社会经济的复兴，到“七七”事变前，有不少户又在这段时间发家致富了，很多户在城市置了房产，在农村买了地。这时比较有规模的，历史较久的有以下这些户：沙记栈、开源栈、津京栈、承兴栈、安利太、运享达、瑞生和、春生和、元丰裕等二十余家。这些托运栈都是天津设总号，北京设分号。它们的运货路线都是从天津往北京运货，属于天津帮。他们户数多，运货量大，在同行业中占主要势力。他们的营业集中地是前门东西两车站。此外，还有少数托运栈专做京汉（北京到汉口）路，京绥（北京到绥远，后通包头）

路。但户数较少，营业范围狭窄。托运业经营货物各有不同，有的专运食品杂货，有的专运土特产品，有的专运日用百货，有的专运鲜鱼水菜，有的专运洋行进口货，有的主营报关，兼营托运，有的还专运灵柩。总之无货不运。它们在兜揽业务中当然离不开互相竞争，竞争唯一手段是运货安全，准确迅速和办事敏捷，这也是雇主最喜欢的。具备这几条业务就兴旺，离开这几条业务就失败。

(二)

托运业的经营方式有包运和托运。

1. 天津帮的经营方式。它们都是“包运”，受理货物，以零货每百斤论价，集中起来装车，是有利可图的。包运货物，得对货物安全负责到底，在运输途中，发生丢失残损，要照价赔偿，具体经营方法是——从天津发货单位受理业务后，由发货单位雇用人力排子车搬运到老车站（即老龙头车站）货场，承运单位收货后负责装火车，运到北平前门东车站，承运单位驻京人员负责卸货。再雇用人力排子车将货送到顾客门里交货。承运任务就算終了。

在雇用人力排子车时，天津有许多行规，主要是脚行头的“把头制”。他们都是恶霸势力；各占一方，每个地段都有地头蛇，在谁的地段货物出境，由谁来发送，别人不能侵犯。如果甲地段来乙地段提货，得给“过府钱”，不给就动武，拼个死活。当地人知道这个规矩，就不惹他们，外地人不懂这个规矩，有人就吃大亏。每个脚行头都拥有若干排子车和拉车的劳动力。并雇有若干“打手”，维护他们恶霸势力。天津脚行头的恶霸势力，有的不止于地段，甚至超出伪政府的势力。如有一个叫王四海的大恶霸，每一个进口船须给他伪币二百元（当时约值二十袋面粉），他派两个打手在船头一站，包你货物不丢不短。果如不给钱，卸船时叫你的货被偷得乱七八糟。天津的恶霸到处都有，他们无所不霸，他们在前清吃的开，民国吃的开，日伪时期也吃得开，受气的老百姓们失望地说：活神仙来了也治不了天津恶霸。但解放以后，恶霸全部消灭了，老百姓的希望得到实现。

北京也有脚行头，但和天津的有很大不同，北京没有地段把头制，他们也拥有若干排子车和劳动力，但不雇用“打手”，他们有固定的主顾，即各个托运单位。脚行头相互之间偶尔也有争斗，但不像天津那样频繁和凶狠。但有一样是相同的，脚行头都不劳动，而是站着拿钱，而且拿的还要多。每当红日西斜，搬运完了，钱拿到手，他们就去吃喝玩乐，追求他们所喜好的生活。

北京脚行头和托运单位的关系，是固定承包关系，托运单位有多少货，承包脚行头，必须当日运清，搬运费按重量计算，事前有固定价钱，平时无争论。脚行头对货物安全也要负责。

脚行头对每个排子车的劳力，也有长期固定的一个架车人（俗称架车），在搬运货物时，架车人临时再找几个拉车人（俗称拉小车）。脚行头开发搬运费时，架车的一个人相当于拉小车的两个人的工资，如架车的挣一元，拉小车的挣五角。因为架车的出力大，拉车的出力少。北京到处都是这个规矩，他们也无争论，拉小车的都是失业生活无着落的人。

每天正阳门桥头都有好多人等着拉小辮，等于农村早晨雇短工一样。拉完一趟说一趟。这种落后状况直到解放以后，公私合营以前。

2. 天津帮还有少数单位，以报关为主兼营托运。北京进口商有从国外进货时，把提单交给报关行，在天津报关纳税，从轮船提货，后由火车运到北京门里交货，不需要顾客着手，把货送到柜台，这对顾客是最方便的了。但是做这种业务必须备有擅长英文的工作人员，因为当时海关的文书和主要工作都是掌握在外国人手中，这样托运站在利润收获上比单靠托运又优厚多了。

3. 京汉、京绥路托运业的经营方式和天津帮的做法完全不同。他们在运货手续上完全是托运方式。例如某客人有一批货运到某处，托运单位把货提来，该包装的给包装该整理的给整理，然后把货送到车站，经过司磅员过磅，然后取得车站票据，加上本单位的费用，向托运人交付票证收取费用，这种责任就算終了。在运途中如发生丢失残损，应由铁路负责。在到达站提货时，向到达站索取商务记录，经铁路上级审核，事故属实后，便由铁路照价赔偿。

4. 京汉、京绥路的托运业者，有的代住旅客，有的代客买卖，向卖方收取佣金。这样既方便顾客，招来业务，又收取旅店费和佣金、托运等费用。顾客增多，业务兴隆，自然利市三倍。总之，方便顾客心理，是谋取利润发家致富的最好途径。

京汉、京绥路托运业和天津帮的托运业，它们绝大部分营业所在地都集中在前三门附近，这是地利条件所造成的。第一、前三门（前门、崇文、宣武）是商业、手工业密集的地方，对外地顾客吸引力最强；第二、前门通东的东车站，是北宁路的重点车站，南通津、沪、杭、东连辽、吉、安、黑。前门通西的西车站，是京汉路的重点车站，南通汉口乃至广州、西连晋、陕、甘。北宁路和京汉路，在北京不能通车，是分线而治。如北宁运京汉的货物，或京汉去北宁的货物，都必须在北前门站换乘火车，这就为北京的托运业造成了发展条件。不仅货运如此，而京汉去东北、津、沪或东北、津沪去京汉的旅客，也须在北京前门东西两车站换乘火车，这就为前门一带的繁华和商店、旅店、饮食、服务等行业的生意兴隆，造成有利形势。

前门东西两车站，现已拆除无存了，在初建时曾经火炽一时，尤以前门东车站（初建时为正阳门车站），在前门古老的建筑群里，出现这一西式建筑，确也显得新颖，别致。

前门东车站在正阳门箭楼东侧，铁路线顺着城墙根迤迤而东。前门西车站，在正阳门箭楼西侧铁路线，顺着城墙根迤迤而西。正阳门箭楼居中，如一只大鹏，左右两条铁路如大鹏两翼，两边火车奔驰时，如大鹏展翅，振羽奋飞，颇极一时之盛。

原来，北京东西两车站是外地旅客出入北京的要道，是货物转口的中心。但是做为一个现代化的城市，人口日益增多，市内交通量日益加大，而频繁的火往来奔驰于闹市内，是很不相适应的，因此在六十年代初期已经全部拆除。从前旅客，货运繁忙的景象，已为北京站和广安门站所代替。而今前门两车站的地址，旧貌全非，原来的城墙拆除后，地面变成宽敞马路，地下修成地下铁路。护城河已填平建成高楼大厦。如果是在解放前离开这里的老北京人而今再来旧地重游，意欲追寻旧貌，将会有不能辨认之感。

(三)

在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爆发后，日本军国主义向中国大举进攻。在穷凶极恶百倍疯狂的日本武装侵略下，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严重摧残。工业也沦于破产的灾难深渊，托运业更是饱受敌人蹂躏的所在。城市里任何机关企事业单位都是日本人掌权，在日本人面前的中国人等于奴隶。各条铁路线各个车站，更是日本人严格控制的地带。托运业经营业务主要靠铁路线。在做业务时，当然离不开和日本人以及他们瓜牙打交道。这行业中在车站货场的作业人员受迫害的事是时有发生。对托运业入站的控制办法是多种多样的。

1. 发臂章限制入站人员。每一个托运单位发一个或二个臂章，如果为方便业务想多要臂章，就得多花钱疏通。每个入站人员必须佩带臂章，如果在车站货场内被日伪发现没佩带证件的人，诬个罪名弄到日本特务机关或宪兵队是九死一生。它那里擅长用的刑法是“灌凉水”。当时老百姓听到日本特务机关，宪兵队都谈虎色变。每个车站货场戒备森严，日本兵站岗时持大枪，上刺刀守卫门口，如凶神恶煞使人望而生畏，当进货场时首先向日本岗哨鞠九十度大躬，每当受到他们盘查时都捏一把汗，不知什么地方被他们看着不顺眼就许大祸临头。

有一个博达托运站的老职工，人称老魏头，为人忠厚老诚，纯朴善良，他的人格品行和托运业务的熟练，素为同行业所器重。一日，他进车站货场的办公室送单据，正遇一个日本人饭后午睡，老魏怕惊醒他惹他不高兴，就轻手轻脚地把单据放在桌子上，将要转身出门，这个日本人忽然起来，暴跳如雷的诬老魏头是“大大的坏人”。一顿拳打脚踢，把老魏头打成重残，医治无效，不久就死去了。受过委屈的人都哀叹地说“中国人好像是没娘孩儿，有冤没处诉去，肚子装的是混合面（七种植物皮糠混合成面），身上挨的日本鞭。”当时人人都感到亡国奴滋味不好受，托运业痛苦更深。

日本人和他的瓜牙，常常利用职权借故敲诈，他们以检查货物为名，横挑鼻子竖挑眼，挺完整的包装硬给你撬得乱七八糟，看你脸上表情不顺眼，还许挨顿暴打。这是钱没花到家，在同行中有个谚语“车站检查严不严，看你花钱不花钱”。如果您真肯花钱运动他们，也真能畅通无阻。在日伪统治八年中的托运业，就是在这样终日提心吊胆下混碗饭吃。但是这仅是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人民蹂躏的一个缩影。它们在农村大扫荡使用三光（杀光、烧光、抢光）政策，老百姓所受涂炭，不知要甚于城市多少倍！

2. 以整理货物为名，摧毁托运业。日本人借口托运业家数太多，车站货物出入太乱，日本人作后台，利用托运业公会名义要淘汰一大批托运小户。淘汰就要失业，立即引起小户的波动。当时同业公会理事长开源栈蒋兆魁，其他理事有京津栈赵连城，大同栈郭某、国益栈尚某等召开同行业开会，硬在现场宣布某某单位保留，某某单位除名。被除名的有三十多户，大家遇到失业的关头，会场哗然大乱，有的年青气盛的意欲动武。蒋兆魁等感到自身危险，就躲在一边由日本人出场，大讲“日中亲善”骗人的鬼话。结果由同行

中刘沛然者，抬出“新民会”和日本人协商，把被除名的三十多托运小户，组成一个“公合”栈，大家共同用“公合”栈名义到车站办理托运业务。在“公合”栈成立大会上三十多家托运小户都参加了新民会，每家都发给新民会五色旗的证章，凭这证章出入车站。大家的生意总算维持下来了，一场风波始告平息。

3. 瓜牙敲诈。日伪时期各个车站货场日本人和大小瓜牙们向托运业敲诈勒索是平常事。前门东车站有一个姓袁的货运员，这人手眼通天，索贿本领很大，过磅时按件要钱，他当一天班，衣兜装满钞票，有时还在下班后拿钱，谁也奈何不了他。有一次被有势力的人把他告发了，站长撤他的职，他给站长下了一跪了事。他干的年代最久，谁也搬不倒他，可是解放以后，他就无影无踪，不知溜到那里去了。

前门西车站货场装卸工，曾因为装卸货向顾客敲不到钱而摔货，发生一幕惨剧。那时的装卸工，在装卸货时，顾客花钱的就轻拿轻放，不花钱的就摔，有一次摔炸了爆炸物，轰隆一声，把四五个装卸工炸得血肉横飞。从此以后他们不敢再摔了。

4. 限制货物出境，在日伪控制最紧的时期，几乎什么货都受限制，当然最严重的是金属货物。凡是运受限制的货物，得有特务机关“许可证”。这种许可证，不是所有托运单位都能得到的，有的能通过日本人弄到许可证，在托运货物时还可借题发挥，多向顾客索取费用。

北京货物出境最难的时候，是日本军国主义行将覆灭前夕，那时晋察冀解放区日益扩大，日伪仅控制“点”“线”（城市和铁路线），它们作垂死挣扎，对京汉路的货运把的最紧，动不动就诬陷“私通八路”，“资敌”。有一次它们在望都车站扣了许多货，说是给八路军运的货物。有好几个托运单位被查封，人被逮捕，托运单位也确有承运八路军物资的掩护地工人员。有的托运单位负责人就是搞地工的革命者。运这类货物，得向车站货运有关人员处处买通。货物白天不能进站，夜间运入，有的货连税卡都逃开了。干这种事，既要有胆量，又要有技巧，还得肯花钱。

当日本军国主义将要灭亡时，北京的老百姓在生活上朝不保夕，小额伪币不值一片手纸，物价一日数涨，托运业更是被累的行业。因为给顾客运货得先垫款，两天收不回款，币值就贬去一大半。每当出一次大额钞票，物价就暴涨一次，在一九四五年日伪发行五百元一张钞票，图案是孔子拜天坛。当时有一歌谣：“孔子拜天坛，五百当一元，撑死囤积者，饿死公务员。”五百元一张钞票，人就如此恐慌，而后又出了二千元一张（还有五千元一张未出笼，日本就投降了），社会不安就可想而知了。那时街巷出现各种悲惨景象，衣着很整齐的人挨门乞讨；穿着绿色制服的邮递员，送信时向收信人讨饽饽。讨时带哀求的解释说：“我们靠工资维持不住生活，没有办法只好向收信人讨点吃的。”车站送票人（曾经一度可用电话向车站买票，每送一张票酬费一角）不要酬费要点窝窝头，一个、半个都可以。受信人和受票人都表同情，十要九不空，有时遇到被讨人真的没有吃的东西，反而向讨要人表示歉意，婉言解释。这是中国人在灾难深渊里互相同情，共济危困的同胞之情。

(四)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军国主义无条件投降了，曾经在中国耀武扬威，穷凶极恶的日本兵，在中国作恶了八年零三十八天，这时在天安门广场，乖乖放下武器，向中国政府投降了。饱受苦难的老百姓，无不额首称庆。长期受日伪欺凌的托运业也舒了一口气；原来新民会成立的“公合”组织，也自然的解散了，同归于同业公会。同业公会也重新改选，理事长由博达钱经理刘沛然担任，蒋兆魁担任付理事长。这时车站的留用人员，也都老实了，不敢公开敲诈勒索。从重庆飞来的接收大员（国民党来北京接收，陆路不通只能从飞机来，当时接收大员代号“飞来的”，）是少数上层人物，和托运行业没有直接接触。他们偶尔出现公共场合，作些政治宣传，极力标榜蒋介石的抗战功绩，宣传军队国家化，政治民主化，大众听来虽是画饼充不了饥，但是八年多在政治上受日本窒息的老百姓，毕竟听到了中国人讲中国话，中国人替中国政府宣传，比听汉奸替日本宣传“中日亲善”“大东亚共荣圈”等等，在感情上舒服多了。同时也有了对国家和民族恢复自由的光荣感。

日本投降后，托运业做过一段比较自由的生意。可是好景不长，不久又回到日本统治时的老路上去。它们依样画葫芦，严加控制出境物资，它们控制最严的是从一九四七年到北京解放。那时到车站办理托运所受限制和检查，比日伪时期有过之无不及。他们控制货物出境的目标是京汉线，怕给八路军运货，有好多出境货物要通行证，不同的是日伪时期是特务机关发的“许可证”，国民党是警备司令部发的“通行证”。不但货物出境要证明，老百姓每个人也得有证明。日伪时期叫“良民证”，国民党时期叫“身分证”，又名“居民证”。没有证明的人是“黑人”。货没有证明不能出境，人没证明不能出门。不用说去外地，就是在本市偶尔出门，不带身份证也要吃大亏。在平津战役的前夕，国民党军事吃紧，有时他们在繁华街市搞突击检查，撤下宪兵警察对行人挨个搜查，没有身分证的人就带走。有的人因出门闲逛没带身分证，竟被拘留扣押，如果认为有点嫌疑或有点油水，就成了被敲诈的对象。

在日伪统治时期，日本宪兵队和特务机关是杀人不眨眼的阎王殿，老百姓提起他们是不寒而慄。胜利后不久，代之而来的是国民党宪兵队和警备司令部，他们常以“治安”“清共”“缉私”等名义出现在前门东西车站，特别是宪兵队，身着绿呢军装，腰系战刀，盒子枪、足蹬大马靴，虎视眈眈成队来到货场，真叫唬人，托运业的人员看到他们来了，立刻踉走，怕吃眼前亏。

由于车站对运货限制检查过严，托运业为了维持营业，又向车站货运员等，明里暗里花运动费。隔断不久行贿受贿的风气，又恢复了原状。有一次安利太货栈在前门东车站运一批糖精，数量比较大，价值比较贵，钱没花到家，被国民党宪兵连货带人扣留了，结果托人情，花了运动费才算了事。同行业有人说：“干这行真不容易，赚俩钱还不够担惊受怕的呢！”躲开阎王，来了小鬼（阎王指日本，小鬼指国民党）。有一位同行业人说：“我多年忘不了的一件事就是在蒋介石大总统“登基”的那一天，被特务打了一个嘴巴。所谓政治民主化简直是骗人的幌子”。在蒋介石选大总统的时候，人民大众看得很清